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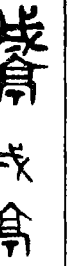



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

沈仲常 黄家祥

国务院列为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成都，是今四川省省会的所在地，也是历史上古蜀国曾经在此建都的地方。她位于川西平原的中部。自秦并巴蜀置蜀郡，“蜀守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作都安堰，穿二江成都之中，溉田亿万顷……，”“於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①此乃说明秦汉之际的成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完成之后，遂有誉为“天府之国”的美称。后来的汉代，因织锦业的发达，曾有“锦城”之称；到五代后蜀主孟昶时，提倡城内遍植芙蓉，又有“蓉城”的称谓。这些名称是秦汉以来的“成都”在不同时代的几种名称，关于这些名称的由来，史书多有记载。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准备利用一些近年来在四川出土的考古发掘资料，对“成都”得名的由来进行讨论。

秦灭巴蜀以前，祖国西南的四川主要是巴和蜀两个较大的王国统治的地方。巴人主要活动于川东，蜀人居住于川西。当时的成都乃是在蜀人活动的区域内，只是在先秦以前是不称为“成都”的。按史书记载，则应视之为“西南夷”中的一部份。《战国策·秦策》中载司马错论伐蜀时讲到：“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说明当时蜀地亦是西边之一的小王国。而今称“成都”的地域理应属于蜀地之中，也是在属于“戎狄之长”的区域内。商周之际的蜀地，当然也是存在的，亦称蜀。殷墟出土的卜辞和陕西周原有字卜骨的出土，都发现有“蜀”字和与蜀有关的刻辞。那么“蜀”与“成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先秦以前没有“成都”一名，能见到的只有“蜀”，由于当时“成都”之地域亦处于蜀人活动的范围内，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只有先从“蜀”这个大的范围来讨论了。《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说明蜀与中原夏、商、周三代是皆共存的。经过考古发掘的，如广汉古遗址和水观音遗址出土的遗物，这种具有古蜀文化特点的文化遗物，证实了蜀的存在。但是在这种早期的蜀文化遗物中并没有发现古蜀文字的遗迹，而后来相当于商周时代的彭县竹瓦街窖藏出土的有“覃父癸”“牧正父己”铭文的铜器，实非蜀地所造，乃中原殷人之器而输入四川。徐中舒先生在《四川濠阳镇出土的殷代二》一文中已有很详细的论述。1981年新都马家公社战国木椁“墓中出一件铭为邵之似鼎”的铜器，亦是南方的楚器而输入蜀地

出土的战国漆器铭文摹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一、三、四川荣经县出土漆器铭文
- 二、四川青川县出土漆器铭文
- 四、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漆器铭文
- 五、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铭文
- 六、凤凰山八号墓出土漆器铭文

的。②这是战国中偏晚期的事情，这些有铭文的铜器俱非蜀地所造。可以理解为早期蜀文化从其发生的时代便与中原的三代文化有所交往，并逐渐受到影响罢了。1972年郫县出土的铜戈和次年在万县采集到的铜戈，这些铜戈，从形制、纹饰的风格上观察，是战国晚期的东西。戈上的铭文至今无法辨识，它们也不是早期蜀文化的器物，而是“巴蜀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除此之外，在“巴蜀文化”的一些墓葬中常有所谓含有巴蜀符号的铜器和印章出土，这些铜器和印章上的符号，可以说它并不是文字，除极个别的一、两个符号象汉字外（例如：“巴蜀”印章中有象汉文字“王”字的符号，这种象“王”字的符号究竟是不是作为汉字的“王”字意义理解，还有待讨论），其他均不具汉字的特点。不论是按东汉许慎《说文》中关于文字的“六书”说或者是当代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的“三书”说去辨识解读，均无法讲通这些铜器、印章上的符号，它们与上面提及到的铜戈上的铭文一样，至今还不能解释它的含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作为上面提及到的铜戈铭文，固然是巴蜀文字，但它还无充分的证据说明是早期巴蜀文化的遗物，它与其它“巴蜀式”铜器、印章上的符号一样，迄今尚不能辨认解读。故在这些遗物上更没有发现“成都”一名的文字或与“成都”一名有关的铭文了。

我们认为“成都”一名，在周秦以前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也发生过变更，它是在秦汉之际出现，并在秦汉以后才普遍流行起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战国至秦汉之间的漆器。先秦时期的蜀地，即为漆和漆器的重要产区，《华阳国志·蜀志》载蜀有“漆、麻、纻之饶。”这些地下出土的漆器亦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漆器工艺的发达，从荣经战国土坑木椁墓出土的漆器至朝鲜乐浪郡发现大量著名“蜀郡工官”的两汉时期的漆器，则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从春秋末或战国早期至两汉时代这段时期的巴蜀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段时期，是巴蜀文化特征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这批漆器的出土，不仅为我们研究这段时期的漆器工艺，巴蜀文化中的漆器

工艺对楚国漆器工艺的影响，以及巴蜀文化、楚文化、秦文化之间在漆器工艺方面互相交流、融合，而且对“成都”一名的来源，对认识“成都”一名在先秦时期的称谓，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并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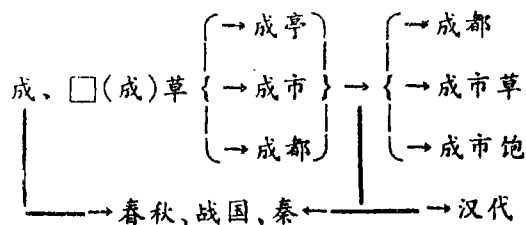
1980年，四川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荣经发掘的战国土坑木椁墓中出土了一批漆器，漆器均无纹饰，髹以黑漆，出土这批漆器的墓葬的时代，其中M1、M12经测定的年代为：M12的碳十四测定的结果，距今 2580 ± 75 年（公元前 630 ± 75 年），树轮校正 2642 ± 125 年；M1碳十四测定结果，公元前 475 ± 60 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 505 ± 70 年。这些测定的数据说明，这批墓葬的时代，约当在春秋战国之际。通过墓葬出土器物的类型学等方面考察，亦基本上与所测定的数据所对应的时代相吻合。因此，所出漆器也当在春秋战国之际了。1982年四川省文管会考古队又在此清理出了一座土坑墓，据清理者介绍，这座墓的时代与上述二座墓的时代相当，出土的漆器也极为相似。可喜的是在漆器（漆盒）上面发现有刻划的“成、口草”的文字（见附图《出土的战国漆器铭文摹本》，以下简称《摹本》），就其文字的书体说来，可能属于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四系说中的“六国系”文字的范畴。字体古朴，带有很浓厚的“刀笔”韵味，这些风格也正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字风格之一。《文物》1980年1期刊载的（《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介绍，青川县战国墓出土大量的漆器，占随葬器品的41%。这批墓葬的时代，据《简报》介绍，其“早期相当于战国中期，晚期相当于战国晚期”。在相当于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漆厄、漆奩）上也发现有填朱的“成亭”烙印和戳记（摹本二）。其文字书体具有铜器铭文、刻石、碑刻的风韵，乃属“秦系文字”的范畴。1977年荣经古城坪秦汉墓中出土的漆器上面也发现烙有“成亭”二字的漆圆盒，它与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漆器上烙有“亭”、“咸亭”戳记的铭文相似，具有秦汉时代的文字风格。荣经漆铭“成亭”，云梦睡虎地秦墓的漆铭

“亭”、“成亭”，其字体的特点是方中寓圆，方整谨严，得有自然的风趣。这些特点是秦汉篆文字的特点，也与秦汉印章上的文字体例一致。睡虎地秦墓中的漆器，如双耳长盒(M3:20)、漆扁壶(M6:1A)、漆厄(M11:10)、漆圆奩(M11:69, M7:12)、漆圆盒(M3:12, M7:7)等，与荣经秦汉墓、青川战国墓出土的双耳长杯(盒)，漆扁壶，漆厄……等同类器物的形制一样，纹饰大同小异。我们认为云梦睡虎地秦墓中的一部份漆器应该是战国秦汉之际巴蜀所产的，而漆器上的“成亭”的“成”可能是“成亭”的“成”字的笔误所致，因为战国秦汉之际正是处于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其文字的变化也是复杂多样的。除此之外，“成亭”的“成”字与战国玺印文字中能见到的“成”字也是相象的，况且商代甲骨文字中的“成”与“成”二字本身也是没有区别的。据上述荣经发掘的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墓葬，青川战国墓群，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针刻、烙印的有铭漆器，按时代先后，其铭文的顺序应是：

成、□(成)草→成(成)亭→成市(草、饱)→蜀郡工官。因此，我们又可以把巴蜀漆器的生产，上溯到春秋末或战国早期了。

那么“成、成草、成(成)亭”，成市，成市草，成市饱”与“成都”一名又有什么关系呢？《说文》里讲“成，成就也，方十里曰成。(阮元《经籍纂诂》)草，《尔雅·释言》：“造也”。“亭，每十里一亭，亭有亭长，以禁盗贼”(《后汉书·臧宫传》注)。“成草”之“草”即作动词“造”字讲，那么“成草”即“成造”。“成市”之“市”《说文》曰市“买卖所之也”；《史记·项羽本纪》：“市，贸易也”；《吕览·仲夏》：“市，人所聚也”。看来“成草”、“成亭”之“成”与“成亭”之“亭”具有地域范围、距离的意思。此外，“亭”与“市”一样还具有商品交易、地区性市场的意义。“亭”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存在，铜器矢方彝，班簋二器铭文中均有“亭”；春秋战国时期有“亭”字的陶文出土不少。《周礼》中记有“宿亭”，并记

有市场设“旌”以“令市”，郑玄注：“上旌者，以为众望也，见旌则知当市也”，与汉代“旗亭”有类似之处。《史记·三代世表·集解》说：“旗亭，市楼也，立旗(市楼)上，故取名(旗亭)焉。”可以说春秋战国之际，亭、市已结合为一体，它是自由形成的商品交易的中心，是一个地区性市场。说明“成都”在未得此名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其范围虽不能准确的说“方十里”但仍可得知在当时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就有小规模的手工业作坊进行漆器生产，并在漆器上面针刻或烙印其产器的地名。与此同时，自由形成的商品交易的地区性市场也随之而出现。因此，我们可以推知，针刻、烙印有“成草”、“成亭”的戳记铭文，就应当是成都未得此名以前的“成都”名，即春秋至战国中晚期时“成都”一名的前身。到汉初，蜀地内地方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从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可以看出反映这种发达场景的繁荣场面。以前由小手工业作坊生产的漆器，此时已成为官营市府经营的行业。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有“成市”的戳记，此外还有“成市草”、“成市饱”的戳印，与此墓时代相当接近的凤凰山八号墓中出土的漆器也有类似的戳记(《摹本》五、六)，说明汉代成都官府漆器手工业生产是相当著称的。有“成市(草、饱)”的戳记漆器，不仅表明汉初官营漆器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有其地域范围比春秋战国时期生产烙印有“成草”、“成亭”戳记漆器手工业作坊和地域范围大的意思。同时，自由的商品交易市场也不断扩大。因此，看来成都这个地方在汉初时尽管已经有“成都”一名了，但在当时的社会一般阶层可能还是较为流行“成市草”和“成市饱”之名。《华阳国志·蜀志》：“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太平御览》卷88引《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成都。”这是记载中的“成都”一名，从相当于记载中的时代先后的考古材料中，还没有发现刻、铸、烙印有“成都”一名的文化遗物。所以“成都”一名的由来，我们推测是从：



演变而来。可以看出“成都”一名与“成亭”、“成市”同时开始存在于战国晚期至秦。《睡虎地秦墓竹简》在竹简中发现有“成都”一名的文字墨迹。今摘录如下：“……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③竹简上的“成都”一名，则应该算作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实物资料了，它为本文中推测的“成都”一名，可能是在战国晚期至秦出现的，增加了一个有力的实物证据。而在秦、汉时期的漆器上为什么又没有见到烙有“成都”一名的铭文呢？我们揣测，可能因为“成都”一名出现不久，或许还只在官府机构中或少数人中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成都”一名才逐渐流传，以至后来普遍使用，所以，在漆器或其他器物上面没有见到烙印或刻划有“成都”一名的文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竹简与青川战国墓葬群中出土的漆器、木牍的时代相比较，就能看出青川出土的烙印有铭文的漆器比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早，青川出土的秦武王二年的木牍，显然比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早约八十年。从字体上观察，虽然都属秦隶，但青川木牍的字体较之睡虎地秦简的字体也略为古朴，是目前所见之最早的秦隶。这些左右逢源的材料，还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成都”一名是由“成亭”以后逐渐成长演变而来的。

随着汉代手工业、农业、商业的发达，

交通和贸易的方便，当时的“成都”商贾贸易市场扩大的区域远远超过了“成草”、“成亭”的范围。《华阳国志·蜀志》等书籍中载蜀王开明建国定都中，有徙居成都的记载。因此，在秦汉之际便有了“成都”一名。“成都”的“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蜀王开明徙居建都“成都”的记载，从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的发掘，^④至少可以为我们理解上述的记载提供线索，很可能与蜀王徙居建都成都有关。所以“成都”一名的含意应包括从很小规模的小手工业生产作坊（如漆器、的生产作坊等）发展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贾自由贸易市场（已具有都市的一些特点）。随着秦灭巴蜀，以李冰为蜀守，他“能知天文地理”，“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灌三郡，开稻田，於是沃野千里……”由小手工业作坊发展到初具规模的商贾贸易市场，和“沃野千里”的出现，为城市的建都奠定了基础。《华阳国志·蜀志》、《史记·张仪列传》中载的张仪城成都，更筑新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这样的自由都市就比战国之际或以前的“成草、亭、市”的范围更大了；加之蜀王开明世曾建国定都于成都，因此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成都”一名的来源和得名的由来，也许略近于历史的真实。

注释：

- ①《史记·河渠书》，《华阳国志·蜀志》。
- ②见徐中舒、唐嘉弘《古代蜀楚关系》，《文物》1981年6期。
- ③见《睡虎地秦墓竹简》261—262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 ④见《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

四川省文博系统举办书画展览

四川省文化厅主办的“四川省第一届文博系统书画展览”於今年七月十日在成都杜甫草堂浣花祠开幕。共展出各地、市、州、县文化局、博物馆、艺术馆、文管会、文管所、文物商店、纪念馆、《天府书画名人录》编委会、《四川文物志》编辑组、省文物复制中心、省诗书画院等单位职工的作品一百二十件。这些作品风格各异，形式多样。生动地反映了我省文博系统职工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水平。

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并对这次展览作了高度评价。这次展览在成都展出后，计划将赴北京等地巡回展出。（木旦勿）